

国际政治

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

林 红

[摘要] 新民粹主义是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思潮,它与20世纪90年代欧洲极右翼思潮的泛滥和激烈的政党政治紧密相连,散发着极右气息,反映了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变迁,是所谓“欧洲右倾”的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与“中左”派政府的无能、战后共识的崩溃、移民大量涌入的压力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直接相关;它与其它极右翼思潮如新纳粹主义有着既联系又区别的复杂关系。虽然极右势力在欧洲的确呈上升之势,但新民粹主义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难以帮助极右政党占据主流地位。

[关键词] 新民粹主义;“欧洲右倾”;政党政治;新纳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5)04-0012-16

民粹主义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它在历史上拥有最具争议性的名声,与声名狼藉的政治阴谋和争民主求平等的进步运动都有复杂联系。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民粹主义充满着好奇,但是,一旦他们走进民粹主义的世界,便迷失在美国“平民党”、俄国民粹派、庇隆主义以及欧洲、加拿大等地的具体个案所展现的不同形态之中,而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时代,他们又遭遇了民粹主义的一种最新形态——欧洲新民粹主义。本文将加入关于欧洲新民粹主义的讨论,试图通过对后冷战时代欧洲政党政治的观察,解析新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根源,它与极右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新民粹主义面临的困境。

一、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基本界定:观察与判断

作为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思潮,新民粹主义也许并不仅限于欧洲,但必须承认它在欧洲的表现最为突出,成熟和影响深远。新民粹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欧洲极右翼思潮的泛滥和激烈的政党政治紧密相连,散发着极右气息。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欧洲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虽然冷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政权大都掌握在由社会党、社民党、工党或由其组成的联合政府等“中左”政

府手中,但是在同一时期,对外来移民的袭击和种族主义暴力行为在欧洲各地持续发生,这种街头反移民情绪随着法国民族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德国共和党等主要极右政党在选举上的成功而进一步高涨。^[1]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洲的政治形势经过十多年的酝酿,终于发生转折性变化。欧盟各国中的许多“中左”政府陆续下台,那些主张排外和反对欧洲统一的极右政党则相继上台执政或参政。1999年,奥地利具有排外和仇犹色彩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27%的选票,成为国内第二大党,并于次年2月与奥地利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2001年春天,意大利的极右派组织,由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演变而来的全国联盟赢得了12%的大选选票,作为第三大党参加了保守派总理贝卢斯科尼组成的联合政府。在2001年11月的丹麦大选中,主张反对移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联合人民党获得了12%选票,成为丹麦第三大党,在议会中拥有25个席位,并由它组成了少数派政府。2002年4、5月间,欧洲更经历了两次强烈的“政治地震”,4月21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击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与右派的希拉克竞争夺总统位置;5月15日,荷兰大选结果再惊欧洲,原执政党工党在大选中只获得23个席位,遭到惨败,而成立刚三个月、持反移民立场的极右政党

“富图恩名单党”却夺得了26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欧洲政治气候的右转、极右势力的扩张也许尚不足以改变全球化之下欧洲主流政治的走势,但它代表了一种“玫瑰色的欧洲”正在被“海蓝色的欧洲”所代替的危机(玫瑰色为社会党标记,海蓝色指代右翼政党)。^[2]在这种危机面前,欧洲学术界陷入一片反思之中,学者们开始讨论如何界定“欧洲右转”的性质。

从传统意义上看,民粹主义的主张中既有平民的呼声,又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叫嚣,既有左翼民粹主义,又有右翼民粹主义。欧洲学者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在欧洲重新兴起反映了极右的一面。皮埃尔·塔格夫直接把勒庞现象定义为民族民粹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认同性民粹主义”,即直接诉诸于民族的共识,勒庞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即是由70年代的“人民的-反人民的”评判标准转变为90年代的“法兰西的-反法兰西的”标准。^[3]汉斯·本茨则认为,由于激进的右翼民粹政党对焦虑与醒悟的公众情绪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使用与工具化,使得人们对它们的定义无法简单界定在激进主义或右派思潮之上,^[4]他认为应该将这些右翼势力的活动放到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显微镜下观察。学者保罗·塔格特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新民粹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粹主义最清楚地反映了民粹主义反制度的政治特征,它虽然并不反对现存政党体系和议会政治,但它坚决反对主流的强势的政党及其政治议程,^[5]塔格特强调了新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政治风格,认为这些欧洲极右政党意识形态上是极右的,政治取向上是反制度的,在组织结构上则是自称代表社会主流并突出魅力化的个人领导。^[6]另一位学者特劳伯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他解释了当代欧洲右翼政党所表现的种种民粹特点,如诉诸于怨恨、偏见和传统价值,只能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简单化理想化解决方案等。^[7]

总的来说,欧洲学者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再现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欧洲是欧洲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欧洲右倾”的重要标志。同时,新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它的“批判性”。新民粹主义自称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现存体制的,这是它的批判性的根源。事实上,民粹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出现之时起就带有一种深刻的批判性,它的批判矛头直指它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新民粹主义发现自己身处欧洲高度官僚化和福利化的国家体系时,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个体系。不过,由于欧洲各国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的民族基础,批判的内容会各不相同,

当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的新民粹主义将斗争焦点指向高税收政策和自由移民政策时,在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这些有着重大的地区与民族分立的国家,新民粹主义则倾向于关注地区民族认同问题。

二是它的“平民性”。新民粹主义与传统的民粹主义一样以“人民”的利益为籍口,声称自己是一种为普通人代言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20世纪末期欧洲人民在移民、治安、政府无能、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压力下的普遍意愿。事实上,新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多数政治诉求更多地反映了欧洲政党政治的需要,反映了极右翼政党在扩大选举基础方面的政治需要,它的“平民性”实质上指的是其支持者的范围,从这个意义看,由于新民粹政党实质上意图介入政党竞争的高政治领域,其所谓的“平民性”的工具意义非常明显。

三是它的“消极性”。新民粹主义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除了反现存体制外,它还带着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倾向,可以说它在思想上是不宽容的,在行动上排他的。它通常是在区别于“本国人”(即本族人)与外来移民(即其他种族人)的意义上援引所谓“平民”或“人民”的概念,而外来移民显然是不被包括在“人民”的概念中的。在新民粹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优越感,由于这些概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力,创造优等的、纯正的、未受第三世界移民玷污的民族成为了新民粹政党进行宣传鼓动的主题。在一些有着高度政治化移民政策的国家如法国、奥地利和德国,新民粹政党确立了以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政治日程表,移民群体成了第一个攻击对象。新民粹主义这种强烈的反移民立场使得它在政治实践中与极端种族主义如新纳粹主义保持着暧昧复杂的关系,也使它被归入极右翼思潮的范围内。

二、欧洲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欧洲新民粹主义以极右翼的面貌出现并迅速发展有着深刻的根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左翼力量的软弱无能和“中左”派政府的政策失误是首要原因。近几年来,欧盟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贫困化加剧,政治丑闻不断,高官贪污腐败现象日趋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各国的“中左”派政府,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拿不出振兴经济和解决问题的良方,他们缺乏远见卓识,采取了一些实用主义和自相矛盾的政策,不仅阻碍了经济增长,还损害了基层选

民的利益,造成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而持续的政治怨恨正是民粹主义萌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其次,民主的衰败和战后共识遭到空前的挑战,民粹主义获得了重生的政治空间。对民主的期望和追求一直是代表所有人希望的目标,但是,“民主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直接攻击的目标,它是从内部开始衰败的”。^[8]二战结束以来,以社会民主为基本理念,以共同经济、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为基本承诺的“战后共识”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早自20世纪70、80年代,这种共识就面临以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学生权利和反对核战争为诉求的新社会运动的严重挑战,新的社会运动催生了以“新政治”为特征的政党组织,^[9]如绿党和“新左派”政党,它们将传统左派的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新解释结合起来,反对以“战后共识”为借口的国家权力的扩张。“新政治”运动对战后民主政治的挑战为新极右思潮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第三,欧洲传统的种族主义与移民大幅增长之间出现越来越紧张的关系。种族主义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对外来少数民族所抱有的潜在偏见并不必然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完全消除,反而,近几年来,随着移民大量涌入欧洲,欧洲选民的种族危机意识不断强化,各国的极右党为争取选民都将反对移民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它们直接把失业和治安等社会问题归罪到移民身上,得到了一定的基层支持。一些法国选民曾说,他们并不赞同勒庞的所有主张,但认为外国移民的确抢走了法国人的饭碗。^[10]当许多选民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和治安无力感到不满时,便把选票投给了主张排外和加强安全的极右派候选人。

第四,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大引起了欧盟国家部分选民的不满。近几年来,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建立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东扩的成功使得成员国已增至25个,这一发展趋势引起了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忧虑与不安,他们认为地方文化、局部经济利益和本土资本正受到激烈冲击,他们为部分失去国家主权而担忧,对不能再使用自己国家的货币而悲痛,对听从超国家的“欧洲的决定”而愤怒,于是在欧洲范围内产生了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商品文化排斥本土文化的仇外、惧外情绪,出现了以加强本土企业竞争力,主张本土利益优先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一些极右派政党趁机打出“反对欧洲统一”和“退出欧盟”的旗号,轻易地赢得了这部分选民的选票。

另外,随着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社区组织、广播网络、教会、商会、工会等的影响力不断衰退,以及二战后欧洲民主政治不断遭到新右派质疑,欧洲极右派精心选择了既可以挑战传统当权政党又可争取基层的政治议题,如移民、失业、社会治安、对主流政党的失望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支持群体。甚至一些主流政党出于政党竞争的需要,也开始效仿极右政党的某些主张,例如,由于极右政党对移民政策的严苛态度使其轻易赢得某些选票,有些中左派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也在移民问题上开始右倾化,这反而扩大了极右翼的影响,因为“太多的政客为了争取便宜的选票正在利用恐惧、偏见和民族差异等公众情绪”,^[11]“法国的各政党正一个接一个地公开陈述明显是从仇外的勒庞那里借用过来的移民主张”。^[12]

三、新民粹主义与其他极右思潮的比较

欧洲极右政党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有着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党,另一种是后工业化时代形成的企图“去法西斯化”的政党。例如,欧洲学者哈斯本斯(Husbands)提出当代欧洲极右翼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阵营,一是新纳粹政党,另一个是民粹民族主义政党,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极右主义思潮主要反映的是后一种政党的理论需要,在形式上与冷战结束前以法西斯主义为主的极右思潮有一定差别。^[13]

新民粹主义是一种最活跃、最具发展潜质的新极右思潮,它的意识形态内核是一系列被描述为右翼极端主义意识或精神的元素,这些元素无一不带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色彩。显然,在一个有着深刻的排它性的、沙文主义的和历史选择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传统的环境中,新民粹主义无法摆历史与传统的影响,它成为了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治合伙人”。在移民问题上,一些欧洲极右派认为,移民除非可以被同化或被接受,否则就是对本土民族与文化的稀释,他们提出了诸如“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维也纳是维也纳人的维也纳”等宣传口号,他们憎恨文化多元主义,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全球化时代的恐惧和“过去的好时光”的无限留恋。

同样处于极右翼阵营的被长期边缘化的新纳粹主义此时也呈现上升之势,它与新民粹主义相互策应,抬升了极右政党的竞争力。一般而言,新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与新纳粹主义并无巨大差别,在政治光谱中都属于极右翼阵营,都持反制度取向,都应用类似的旨在削

弱现行体制合法性的政治模式,^[14]前者是危机意识的产物,发生于社会转型、变革的紧张时期,是历史上各地经常出现的社会现象,后者是德意志民粹主义的特殊表现,其特点在于其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传统纳粹主义不可能再在德国与奥地利出现,但它有可能借助民粹主义而还魂。因此,在后工业化的欧洲,一个新纳粹政党可能会采纳新民粹政党的立场,或者一个新民粹政党在关注移民问题时可能会倾向于新纳粹主义。实际上,欧洲极右政党可能既有新纳粹倾向又有新民粹立场,如德国的共和党、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Flemish Bloc)。

有学者认为,新民粹主义与新纳粹主义的结合为右翼政党对欧洲政治体系的突然袭击提供了真正的政治动力。^[15]以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为例,海德尔1986年成为该党领袖后,为这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注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内容,他将仇外的法西斯政治特征与信奉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传统家庭价值和反移民的新民粹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对奥地利政治体系进行了持续的猛烈的攻击,并赢得了议会选举,进入了政府。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政治目标来看,新民粹主义与新纳粹主义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潮,它们之间在以下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是最具体的其实也最难查证的,即这两种思潮的历史延续性的不同。新纳粹政党一般与以往历史时期的纳粹政党有某种渊源,如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党最早是1946年由纳粹主义者在政体崩溃之际为挽救其政治遗产而建立的,学者伊格纳兹在他的研究中列出了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有历史联系的欧洲极右政党名单。^[16]相对而言,新民粹政党则缺乏这种历史联系。

第二个差异在于,新民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政治目标完全不同。新民粹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参与议会政治,取代腐败的精英的传统政党,它并不反对现行的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虽然可能具有公开的或含蓄的反移民立场,但反移民却很少成为新民粹政党争取政党认同的单一源泉,换言之,反移民立场在新民粹政党的政治日程中经常与其他突出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瑞士的“汽车党”(Swiss Automobilists' Party)就把新民粹主义与环保诉求结合在一起,而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以及瑞典的新民主党在反移民的同时,持坚决的反高税收立场。相对应地,新纳粹政党的目标非常单纯,虽然它们也对其他问题表示关注,但他们基本上是一

个种族主义政党,他们的政治日程表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反移民议题占据。

第三个差异,新民粹主义由于包含民主的内涵而可能在褒义上使用,而新纳粹主义则永远没有这个可能。新民粹主义和传统的民粹主义一样天生具有双重性,即它可能有消极的一面,也可能有积极的一面。虽然新民粹主义也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并且因为明显的反移民立场而带上消极色彩,但它一向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17]因而它可能是积极和进步的,甚至在后现代阶段具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前景。^[18]相对而言,新纳粹主义更多的与狭隘的种族主题相连,反映了一种与全球化时代完全不符的种族危机意识,支持者范围非常有限,被边缘化的程度远大于新民粹主义,而且在政治斗争的方式上,它更专注于街头政治,种族暴力倾向非常突出,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

从目前欧洲极右势力的增长趋势来看,显然新民粹主义的社会认同度上要比新纳粹主义大得多,虽然二者属于极右型理想主义政治主张,但前者的发展性是后者无法相比的,在意识形态、组织建构和社会支持等方面,新民粹主义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政治定位得到的社会认同度较大。应该看到,新民粹主义的上升更主要的是与欧洲社会与经济的深层变化联系在一起,是对当代政治发展所依赖的广阔社会背景的另一注解读和反应。

四、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困境

后冷战时期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变迁有利于新民粹主义或其他极右翼势力的社会动员,新民粹主义也的确对现行政党政治构成了威胁,但是,从总体而言,新民粹主义尚不可能进入政治主流,也不具备颠覆欧洲战后政治传统的能力。与此同时,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新民粹主义的迅速发展。

其一,虽然欧洲主流政党偶尔不得不对极右党的某些政策主张妥协,但它们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极右势力的上升,它们对主要政治资源与组织资源的控制以及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盟是新兴极右政党短期内无法挑战的。法国“国民阵线”领袖勒庞在首轮总统选举胜出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即发表电视讲话,向极右势力宣战,他在“担心极右势力一旦掌握国家大权会带来非常

严重的后果”的同时,号召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抵制极右势力”。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防止勒庞当选,号召他们的党员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投希拉克的票。最终,希拉克成功连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法国大选后表示,“法国大选的最终结果是民主的胜利和极端主义的失败”,德国总理施罗德也说:“蛊惑人心的政治,对我们共同价值观的蔑视,对欧洲大家庭的背离,这些不是我们将来需要的模式。”^[19]

第二,欧洲民主发展历史悠久而卓有成效,欧洲民间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极右势力的民主力量、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最重要的是根基深厚的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2002年5月6日,荷兰极右翼领袖富图恩突然遇刺身亡,成为继勒庞事件后又一次欧洲“政治地震”,据BBC的报道认为,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对欧洲新兴极右势力最成功代表人物的袭击,反映了部分民众对极右势力崛起的担忧。法国的勒庞事件后,法国的政界、舆论界、学生、市民开始联系起来,向法国的极右势力进行讨伐和围剿,举行了以反勒庞“民族阵线”,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种族歧视为诉求的街头抗议。

第三,新民粹主义等极右翼势力内部存在着同族互弑、分化以及政党领袖的继承等问题。当前,欧洲各国极右派政党之间缺乏组织上的联系。在政党组织上,新民粹政党十分依赖“有魅力”的领袖作政党号召,以挑战传统政党的职业化、官僚化体制。^[20]如勒庞与法国民族阵线,富图恩与富图恩名单党,海德尔与奥地利自由党,博西与意大利北方联盟,一旦这些政治人物不能再领导该党,这些政党的领导人继承问题直接关系到该党的影响与发展。

第四,新民粹政党如果参与政党竞争,必须接受当前选举制度的约束,欧洲许多国家议会一般采用比例代表制,各政党参与议会的代表比例有配额约定,小政党事实上是受排斥的。因此新民粹政党作为一种新兴的非主流、非传统政党,在政党与选举体系居于并不有利的地位,它们的发展空间面临现实的制度限制。同时,新民粹主义极端的竞选立场在选民中会激发对立与争议,也不利于这些政党争取更多的选民。虽然形象极端的勒庞在选举时开始进行“去魔化”的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软化其“种族歧视”的形象,并在第一轮胜出后呼吁“法国男女不分种族,宗教与社会地位,为此次民族复苏的历史契机团结一致”,但他的温

和化姿态仍无法动员大多数的中左派选民。

总的看来,虽然今后较长的时间内,极右派还不会成为左右欧洲政局的主流政党,欧洲仍将是“中右”或“中左”政府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欧洲极右势力的上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新民粹主义更为引人注目。最近几年来,以新民粹主义或新纳粹主义为理论支持的极右派政党在许多国家开始参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日益冲击由主流的传统政党把持的议会与选举体制,他们正在发展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不可小视的新生力量,成为一种某些舆论所说的“新的极右派”。

[注释]

- [1] [6] [20] Paul Taggart,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8, No. 1, Jan, 1995, p. 34, p. 36, p. 41.
- [2] 《环球时报》2002年5月23日,第3版。
- [3] Paul Piccone & Gary Ulmen, “Populism and the New Politics”, *Telos*, Spring 1995, Issue 103, p. 5.
- [4] H.-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4.
- [5] Paul Taggart, *Populis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3.
- [7] [13] Piero Ignazi,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 p. 197.
- [8] Martin Yark, “New Barbarianism”, *Guardian*, May 9, 2002.
- [10] 郭京花:《国际随笔:极右势力与移民问题》,人民网,2002年5月8日, www.people.com.cn.
- [11] “Editorial”, *The European*, Sept. 1991, pp. 27-29.
- [12] *The Economist*, 28 Sept., 1991, p. 67.
- [14] Michael, Minkenberg, *Die neue radikale Rechte im Vergleich: USA, Frankreich, Deutschland*,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8, p. 2.
- [16] Piero Ignazi, “The Silent Counter-Revolution: Hypotheses on the Emergence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July 1992, p. 10.
- [17]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 [18] Paul Piccone, “Postmodern Populism”, *Telos*, Spring, 1996, pp. 45-86.
- [19] 张宝祥:《欧洲政治形势右转》[J],《人民论坛》2002年第7期。

作者简介: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5-03-15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by Hou Hongyu*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is the sole multilateral regime regulating the export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and dual use items at present. The world's major arms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are its members. Legally speaking, it is not a formal organization. It highlights transparency of the export of arms and dual-use items so as to prevent potentially destabilizing accumulation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re must be a consensus among member countries when the Arrangement makes any decision. Its control lists are of some authority. However, the Arrangement has evident limitation.

- 7 **Religious Nucleoli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the U. S. A. and the Islamic World as Reflected in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by Zhang Zhi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IR Realism, the "9·11" incident is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 dispa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world. Then,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great disparity of power? This article makes inquiries into it and recognizes that the divergence of material wealth concepts of Islamism and Protestantism is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 reasons. Since the two religions are the hardcore s of their civilizations, the great disparity of powers represents the clash of these two religion-based civilizations. Accordingly, from the incident of "9·11", we can see religions being the hard nucleoli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the U. S. A and the Islamic world.

- 12 **The European New populism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by Lin Hong*

European new populism mirrors the great chang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and consequently becomes a signpost of "European leaning to the right". It emerges in Europe 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ability of "central-left" governments, the collapse of post-cold war consensus, the pressure of influx of immigrants and the deepen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lthough extreme right thoughts rise rapidly in Europe, new populism still has to overcome some barriers for its expansion. It is very clear that i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new populism won't have the ability to help extreme-right parties to become dominant.

- 17 **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Provided by the Kyoto Protocol** *by Chen Gang*

The global warming problem demands joint effort taken by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ince each country has to shoulder enormous economic burden whe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 speci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s needed to help state actors give up "free-ride" policies.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took effect early this year to curb climate change, gained extensive support from most countries through successfully providing "selective incentives"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This article, using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 argues that it is differentiated benefit given to individual actors that attracts stat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s for solution of transnational public issu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2 **U. S. Kashmir Polic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ts South Asia Strategy** *by Ma Rongsheng*

U. S. South Asia Strategy of Balanc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has been established after years of adjustmen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relatively clearer Kashmir policy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this policy cannot be brought into effect easily due to inconsistency of U. S. South Asia Strategy. Within a period from now on, U.